

# 「懸想」與「神思」

## ——魯迅、韓松與未完的文學革命

王德威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

### 一、前言

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等號召「文學革命」，為五四運動揭開序幕。由文學所承載的批判性及創造力，成為啓動、支撐革命想像和實踐最重要的資源。所謂「文學」，不僅限於學院規劃的紙上文章，而是一種應答並改變世界的方法，一種石破天驚的活力，一種無中生有的發明。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有言：「革命的意義無它，即在於引發自由、創新的感動力 (*pathos of novelty*)。」<sup>1</sup> 這一革命性的動人力量見諸五四，就是文學。

然而環顧五四百年後文學及文學研究，早已馴化為文化建構的一環。學院論述謹守分際，曰啓蒙、曰革命，無不似曾相識。在「和諧」的年代裏要求無中生有，改變世界，談何容易？但這樣的現象不必意味「文學革命」到此告一段落，反而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五四文學的論述與實踐的複雜面。我們必須挖掘「文學革命」所曾具有的潛能，以及被遮蔽的過程。

本文藉由魯迅文論的兩項觀念，「懸想」與「神思」，探索五四文學意涵，以及當代的回應。這兩項觀念都強調「想像力的政治」：敷衍人生邊際的奇詭想像，深入現實盡頭的無物之陣，探勘理性以外的幽黯淵源。從〈科學史教篇〉到

---

<sup>1</sup> “Only where this *pathos of novelty* is present and where *novelty* is connected with the idea of freedom are we entitled to speak of revolution.”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90), p. 34.

《野草》、《故事新編》，魯迅的著述遊走歷史與虛構邊緣，跳脫科學與玄學分野，在在顯示其人文學觀的犀利與深沉。

現當代文學主流論述以寫實／現實主義掛帥，「神思」與「懸想」一向隱而不彰。反而是新世紀科幻小說的異軍突起，提醒我們文學革命中這些被湮沒的觀念；又或者這不盡是歷史的偶然。在二十世紀初，魯迅的文學事業即以翻譯（如《月界旅行》）、改寫科幻小說（如〈造人術〉）開始；他的早期文論也不斷思索科學與文學的分野。誠如當代學者指出，魯迅的〈狂人日記〉(1918)不妨以科幻小說來閱讀<sup>2</sup>。

〈狂人日記〉一百年後，韓松(b.1965)的《醫院三部曲》（《醫院》、《驅魔》、《亡靈》）(2016-2018)，為新世紀以來方興未艾的科幻小說熱潮再添力作。韓松是與劉慈欣齊名的科幻作者，作品陰鬱詭譎，充滿強烈末世隱喻。《醫院三部曲》以宇宙的存在就是「醫院」為主題，寫出另類魯迅式「鐵屋子」寓言，在在令人側目。

〈狂人日記〉與《醫院三部曲》各據百年五四一端，形式極其不同，但都觸及「神思」與「懸想」的多重維度，並展開隱秘對話：如科學與文學，身體與國體，瘋狂與理性，疾病與醫藥，入魔與除魅。更重要的，兩位作家都藉此叩問書寫與文學的根本意義，及其革命性真諦。

## 二、神思，懸想，聖覺

文學／革命所形成的辯證論述可上溯至晚清，借鑑之處來自日本與歐西諸國。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梁啟超推動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革命。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中，他宣稱小說為革命啓蒙的法門，原因無它，「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sup>3</sup>。梁啟超將傳統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反轉為救國利器，本身就充滿革命張力。這類論述在五四期間發揚光大，成為主流。

<sup>2</sup> 嚴鋒：〈〈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金庸去世標誌武俠弱科幻興〉，網址：<https://new.qq.com/omn/20181113/20181113B1JFY6.html>；宋明煒：〈科幻文學的真實性原則與詩學特徵〉，網址：<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416/c404080-31031415.html>，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

<sup>3</sup> 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758-760。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上焉者發揮啓蒙警世功能，下焉者則成爲宣傳或教條藉口。

但五四文學與革命的關係無需局限在此種辯證邏輯裏。恰恰在新文學鵲起同時，有心知識分子如魯迅已開始思考文學在教化或新民以外的潛能。而文學之於革命，不僅意味對現狀的批判或搏鬥，或知其不可爲而爲的吶喊與彷徨，更重要的，指向一種虎躍豹變的超越<sup>4</sup>。早在五四之前，魯迅已經進行「文學何爲」的複雜論述，從〈科學史教篇〉到〈摩羅詩力說〉，都留下青年文學革命者的思辨痕跡。

一九〇七至〇八年間，魯迅在日本完成〈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等系列文章<sup>5</sup>，思考維新知識分子面對西學衝擊的因應之道。其中最早發表的〈人之歷史〉仍然饒富生物學及進化論色彩，但青年魯迅已經開始強調「人類之能，超乎群動」<sup>6</sup>的人文能動意義。而他在〈摩羅詩力說〉更進一步指出文學介入「人間情況」的樞紐意義。有鑒於中國傳統抱殘守缺，魯迅強調「別求新聲於異邦」<sup>7</sup>。這樣的新聲非摩羅詩人莫屬<sup>8</sup>。如魯迅所言，摩羅始自印度，原意爲天魔，傳至西方，即成爲魔鬼，爲撒旦。而在當代的詩人裏，摩羅的代表首推浪漫詩人拜倫。拜倫之外，有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裴多菲等人；摩羅詩派裏又有「復仇詩人」、「愛國詩人」、「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的詩人」之分。「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sup>9</sup>。摩羅詩人最重要的能量即在於「攫人心」：撩撥人心、鼓動民氣。

<sup>4</sup> 所謂「虎躍」(tiger's leap)，來自本雅明的觀點。Walter Benjamin,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 254. 在這爆炸性的一刻，非同質性的時或事自原有時空抽離，相互撞擊，產生辯證關係。革命契機以及猶太教的天啟因此而生。

<sup>5</sup> 一九二六年，魯迅將前四篇文章收入雜文集《墳》。〈破惡聲論〉之後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有關這五篇論述討論極多，如汪衛東：《魯迅：現代轉型的精神維度》（臺北：秀威資訊出版，2015年），頁6-9。

<sup>6</sup> 魯迅：〈人之歷史〉，《墳》，《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8。

<sup>7</sup> 魯迅：〈摩羅詩力說〉，同前註，頁65。

<sup>8</sup> 「摩羅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歐人謂之撒但，人本以目裴倫(G. Byron)。今則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爲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爲傳其言行思惟，流別影響，始宗主裴倫，終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同前註，頁68。

<sup>9</sup> 同前註，頁101。

摩羅詩人雖然來自異邦<sup>10</sup>，魯迅卻將其譜系嫁接到中國傳統，並以「新神思宗」作為命名。眾所周知，「神思」源出《文心雕龍》，所謂：「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思理為妙，神與物遊。」<sup>11</sup>但魯迅的用法則與歐西浪漫主義掛鉤<sup>12</sup>，他心目中的摩羅詩人掙脫溫柔委婉的「情」「志」傳統，而淹然有鬱憤之情，叛逆之志。相對於傳統詩學的思無邪，魯迅的「神思」極致處是思有邪：

如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後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志。<sup>13</sup>

換句話說，新「神思」成為一種時代反抗精神的體現。相對興觀群怨，魯迅要發出「真的惡聲」<sup>14</sup>。

另一方面，魯迅又在古希臘文化中發現「神思」另一源頭——神話。在〈摩羅詩力說〉中，他寫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闕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sup>15</sup>文學的不用之用在於「涵養人之神思」。他於〈科學史教篇〉中肯定希臘「思理之士」，「研索天然」，不僅發現科學的「真源」，也同樣見證「神話」的勃興。「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於膚廓，方諸近世，直無優劣之可言。」因此他批評近世奉理性之名嘲笑神話為迷信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憫諫也。」<sup>16</sup>

蓋神思一端，雖古之勝今，非無前例，而學則構思驗實，必與時代之進而

<sup>10</sup> 學者已經指出，摩羅源出於印度，經過日本以及歐西而影響了魯迅，此處略而不論。參見北岡正子著，何乃英譯：《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

<sup>11</sup> 日本學者木山英雄、伊藤虎丸都指出，魯迅「神思」與《文心雕龍》的關聯。見木山英雄著，趙京華編譯：《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27。伊藤虎丸著，張猛等譯：〈早期魯迅的宗教觀〉，《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2。又見朱康：〈「神思」、「神話」、「詩歌」：魯迅關於文學起源的人類學敘事〉，《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1期，頁20-24。

<sup>12</sup> 伊藤虎丸著，張猛等譯：〈早期魯迅的宗教觀〉，頁93。

<sup>13</sup> 魯迅：〈摩羅詩力說〉，頁70。

<sup>14</sup> 「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鴉的真的惡聲在那裏！」魯迅：〈「音樂」？〉，《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56。李怡：《魯迅的精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2012年），頁72。

<sup>15</sup> 魯迅：〈摩羅詩力說〉，頁65。

<sup>16</sup> 魯迅：〈科學史教篇〉，《墳》，頁26。

俱升，古所未知，後無可愧，且亦無庸諱也。<sup>17</sup>

也因此，在〈破惡聲論〉裏，他認為「神話之作，本於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則逞神思而施以人化。」<sup>18</sup>於是有了「僞士當去，迷信可存」<sup>19</sup>的名言。

據此，魯迅對「神思」的解釋投射兩種歷史性判斷，一方面是與時代精神接軌的摩羅詩力，另一方面則是上溯原始神話迷信；一方面是充滿當下存在危機感的「思有邪」，一方面是太初最素樸的「白心」、「古心」<sup>20</sup>。恰與當時流行的進化實證論述相對，歷史之於魯迅不僅是推陳出新的時間流變，也同時是亙古如新的返本歸元。魯迅之師章太炎「聲入心通」、「鼎革以文」、「俱分進化」觀對他的影響歷歷可見<sup>21</sup>。據此，他所嚮往的「惡聲」也充滿弔詭。這「惡聲」撻伐傳統詩教的虛飾，卻又同時揭發當代科學知識的偽善。

魯迅以如此定義的「神思」來推動文學，內裏的張力可想而知——而我認為這也正是魯迅文論的革命性所在。後之來者每每將魯迅文論快速簡化為意識形態的進步表徵，其實忽略了他寄託於「神思」的力量俱分進化，哪裏是奉某某主義之名的革命所能得其萬一？

魯迅晚年又提出「懸想」，緣起於他對朱光潛治學方法的批判<sup>22</sup>。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朱光潛(1897-1996)為文賞析唐朝詩人錢起(722-780)詩作〈省試湘靈鼓瑟〉，謂末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有「靜穆」之美。魯迅持反對看

<sup>17</sup> 同前註。

<sup>18</sup> 魯迅：〈破惡聲論〉，《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頁32。

<sup>19</sup> 同前註，頁30。

<sup>20</sup> 郜元寶曾將魯迅「神思」與其他觀念與中國傳統心學聯繫，見郜元寶：《魯迅六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亦參見郜元寶對科學與神思的辨析，《為熱帶人語冰：我們時代的文學教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47-66。

<sup>21</sup> 有關章太炎的文學復古即革命，俱分進化等觀點極為重要，但非本文討論重點。可參見如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革命與章太炎「復古」的新文化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陳雪虎：《「文」的再認：章太炎文論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聲入心通」一詞借用自王東杰書名，王東杰：《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該作研究方向有別章太炎對聲的論述。

<sup>22</sup> 根據魯迅博物館的魯迅著作檢索系統，魯迅一生使用「懸想」一詞共計四次。本文所論為具有文論意義者二處。此外還有：(1)《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1923)「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說，故唐人小說在元既已侵入雜劇及傳奇，至明又侵入了話本；然而懸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遜於敘述明朝故事的十餘篇遠甚了。」(2)《離婚》(1925)：「愛姑瞪著眼看定篷頂，大半正在懸想將來怎樣鬧得他們家敗人亡。」謹謝李浴洋博士提供檢索資料。

法。他在〈「題未定」草〉中諷刺朱乃斷章取義，無視文本內外互涉的複雜關係：這首詩是應制詩，目的在彰顯才華以為進身之階，其主題既無關個人，也非自發。朱光潛以「靜穆」作為全詩情感表達的終極要義，自然以偏概全。魯迅「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sup>23</sup>。

魯迅的批判牽涉五四之後對文學的方法學問題。我在他處指出，朱光潛和魯迅以各自的方式，回答抒情主體如何有助於闡明歷史境況<sup>24</sup>。朱光潛指出人生經驗猶如浮光掠影，只有在詩歌中得到淨化昇華，人之於歷史的意義及其超越因而發生。而魯卻認為歷史洪流滔滔，其意義難以滌清。然而這並不能成為學者架空歷史的藉口。他以一則軼事說明：

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麼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乾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裏，閃閃的發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啓示。這啓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於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乾乾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sup>25</sup>

魯迅諷刺當代「偽士」沉湎於歷史層層斑駁積澱，殊不知倒果為因，反而失去體察歷史本真面目——及其物質性——的能力。他又寫道：

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sup>26</sup>

<sup>23</sup> 魯迅：〈「題未定」草〉（七），《魯迅全集》第六卷，頁440、441、444。

<sup>24</sup> 見拙著：《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7年），第二章。

<sup>25</sup> 魯迅：〈「題未定」草〉（七），頁441-442。

<sup>26</sup> 同前註，頁442。見張夢陽的討論，張夢陽：〈深讀魯迅，學會思考〉，《光明日報》第5版，2011年10月31日。

這裏的關鍵詞是「懸想」。如同「神思」，「懸想」也是古語，意為掛念<sup>27</sup>，又指揣測，猜想<sup>28</sup>。而在近代，嚴復翻譯《天演論》則強調懸想的憑空想像意義：「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凱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sup>29</sup>魯迅有可能受到嚴復的啓發，但他的解釋更為複雜，因為他希望「懸想」所達到的，不是憑空捏造，而是歷史的探究。換句話說，「懸想」反而拂拭了歷史的積垢，揣摩歷久而彌新的本色。而這一過程與其說是依靠知識分子的評頭論足、上下考證，還不如說是有賴下里巴人無視歷史的層層積澱，對事物、對生活「本色」所呈現的好奇：返古不是懷舊，而是為了開新。「懸想」越過斑駁的時間軌跡，想像事物原初的狀態。

「懸想」一詞讓我們聯想魯迅早年所作的〈科學史教篇〉中另一類似關鍵詞——「懸擬」。在文中，魯迅雖然認知科學的重要，但不以培庚 (Francis Bacon) 以降的經驗主義，以及內籀（歸納）法形成的實證科學為然。「顧由是而培庚之術為不完，凡所張皇，僅至具足內籀而止。內籀之具足者，不為人所能，其所成就，亦無逾於實歷；就實歷而探新理，且更進而窺宇宙之大法，學者難之。況懸擬雖培庚所不喜，而今日之有大功於科學，致諸盛大之域者，實多懸擬為之乎？」<sup>30</sup>

相對於歸納法，魯迅提出「懸擬」(hypothesis) 作為調和。「懸擬」關乎假設與想像，雖然病於「遠古」「誇大之風」，但以其所激發的想像、演繹能量，才真正是「探新理，且更進而窺宇宙之大法」的竅門。不僅如此，學者如蔣暉指

<sup>27</sup> [漢]張芝〈與府君書〉：「前比得書，不遂而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慙？」（陳新雄：《訓詁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183。）庾信〈擬詠懷〉之十：「遙看塞北雲，懸想關山雪。」（〔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3，頁236。）〔宋〕蘇軾〈與王定國書〉：「知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慰懸想。」（《蘇東坡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下冊，頁363。）

<sup>28</sup> 「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卻不知貫箇甚麼。」〔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冊，頁1149。

<sup>29</sup> 赫胥黎著，嚴復譯：〈察變第一〉，《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魯迅在〈瑣記〉一文中提到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中的這段話，且說道：「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魯迅：〈瑣記〉，《朝花夕食》，《魯迅全集》第二卷，頁306。

<sup>30</sup> 魯迅：〈科學史教篇〉，頁31。

出，魯迅文中對「懸擬」的把握是透過赫胥黎的「divine afflatus」一詞，並譯為「聖覺」：

英之赫胥黎，則謂發見本於聖覺，不與人之能力相關；如是聖覺，即名曰真理發見者。有此覺而中才亦成宏功，如無此覺，則雖天縱之才，事亦終於不集。說亦至深切而可聽也。<sup>31</sup>

「聖覺」意味富有詩意的靈感與創造力，忽焉發生，心領神會，如有神助。在這層意義上，魯迅藉赫胥黎的觀點強調了科學不必只是歸納法所主導的實證觀察或實驗結果，也同時有賴靈光一現的啓悟。

「懸想」與「神思」的觀念看似與中國現代知識體系的追求——啓蒙、理性、科學——背道而馳，但魯迅別有所見。在他的視野裏，「神思」神遊物外，以匪夷之所思引領逆向想像，「懸想」出虛入實，擱置視為當然的成見，重新考掘事物的真相。兩者都強調現實當下的無明與因循，無法以理所當然的科學啓蒙所解脫，更不能以進化論革命論所簡化，而必須涉及想像力的介入，以演繹、發想，而非歸納，人與世界的密切關係。而介入的方法付諸實踐，就是「文學」。

### 三、科學、玄學與「懸學」

魯迅以「懸想」與「神思」所發展出的文學觀在五四時期及其後並未受到重視。現代中國文學主流強調寫實／現實主義，以文學作為反映世界，針砭人生的法寶。蘊於其下的科學、實證語境不言可喻。事實上，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初，五四重要的文學批評者及小說家茅盾(1896-1981)提倡自然主義，即以「科學描寫」、「客觀觀察」作為新文學的圭臬。他以法國自然主義大師左拉(Émile Zola)為偶像，認為只有比寫實／現實主義更為精準的自然主義才能真正描摹人間，繼而激發改變現狀的動力<sup>32</sup>。

茅盾的文學姿態反映五四時期唯科學主義的強烈傾向。一九一五年《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創刊，成為五四先聲。同一年由留美學生主辦的《科

<sup>31</sup> 同前註，頁30。又參蔣暉：〈維多利亞時代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誕生：重考魯迅〈科學史教篇〉的資料來源、結構和歷史哲學的命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頁32-42。

<sup>32</sup> 見拙著：*Fictional Realism in 20<sup>th</sup>-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2。



學》出版，成爲國人創辦的第一本介紹科學的雜誌。這兩份刊物，一鼓吹民主，一鼓吹科學，成爲當時的重要口號。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發表〈敬告青年〉：「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爲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sup>33</sup> 陳定義的科學，「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sup>34</sup> 一時「科學萬能」成爲嶄新社會共識<sup>35</sup>。

學者從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到郭穎頤 (Daniel W.Y. Kwok) 等早已指出早期現代中國的唯科學主義傾向。後者對此的定義是：「從一個傳統或遺產中產生的一項信仰，在這項信仰中有限的科學原則被廣泛地應用，並成爲這個文化的基本預設及不證自明的公理。更嚴格地說，『科學主義』是這樣的一種思想：『它把所有的實在都排放在一個自然秩序之內，而且認爲只有科學方法才能理解這一秩序的所有方面，無論是生物的、社會的、物理的或心理的。』」<sup>36</sup> 當科學被無限上綱爲解釋並實踐現代性的唯一法門時，科學竟成爲一種神話，一種宗教式信仰，至於其內容或實踐的得失如何，反而無關緊要了。

唯科學主義論述於五四之後引起種種反思，以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科學與玄學（或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最爲受到矚目。有關這場論戰的研究已所在多有，在此僅作簡述。一九二三年二月，時任北大教授的張君勱 (1887-1969) 在清華大學主講〈人生觀〉，提出科學對人生觀無所作為，人生安身立命之道在於自由意志，而非科學方法及因果邏輯。有鑒於科學的經驗主義與分門別類，張強調人生觀的個別、主觀、綜合、直覺特性——「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張之。」<sup>37</sup>

<sup>33</sup> 陳獨秀：〈敬告青年〉，《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頁9。原載於《青年雜誌》1915年第1卷第1期，頁1-29。

<sup>34</sup> 同前註。

<sup>35</sup> 署名「造五」者在〈科學之價值〉一文中已提出科學是實理的、分類的、進步的、歸納的，也是萬能的。造五：〈科學之價值〉，《東方雜誌》第12卷第7號（1915年7月），頁59-60。

<sup>36</sup> Daniel 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6. See also, Yu-sheng Lin (林毓生), "The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sm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 Case Study, the Debate on 'Science vs. Metaphysics' in 19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含意——對「科學與玄學」之爭的研究〉，《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頁254。

<sup>37</sup> 張君勱：〈人生觀〉，帕米爾書店編輯部編：《科學玄學論戰集》（臺北：帕米爾書店，

張君勱之說引起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1936)強力反駁。丁在《科學與玄學》中主張「科學是萬能」，所謂科學並不局限於物質生活與實證試驗，也同樣及於精神生活。科學精神可以排除主觀直覺，超拔人生<sup>38</sup>。

張君勱、丁文江的辯難很快成爲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論戰，參加者包括張東蓀、林宰平、胡適、任叔永、范壽康、王星拱、唐鉞等。曾以無政府主義知名的吳稚暉，以及維新前輩梁啓超等也加入表態。論戰最激烈處，丁文江直指張君勱及其從者爲「玄學鬼」。與此同時，左翼知識分子如陳獨秀、瞿秋白、鄧中夏等根據馬克思主義思想提出唯物史觀批判。唯物史觀派也信賴科學方法，但認爲科玄兩派表面壁壘分明，其實不脫唯心傾向。真正科學主義必須根植於唯物歷史觀：「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sup>39</sup>一九二五年，上海亞東圖書館輯科玄論戰文章爲《科學與人生觀》，邀請陳獨秀、胡適作序，羅列各家觀點，誠爲五四之後論述最重要文獻之一。

論者早已指出，「科學與玄學論戰」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五四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現代性的反思。如果民主與科學曾是五四諸子所效法的目標，歐戰的殘酷，戰後歐洲的民生凋敝在在證明西方所代表的現代工程——從進化論到工業化，從科學主義到理性實證主義——漏洞百出。張君勱等從中國儒學傳統找尋資源，結合西方伯格森、倭鏗等所倡的「唯心」哲學，不啻是眼前無路想回頭之舉。但玄學派空談心性，難以回應科學派憑藉實證論述所作出的反駁。相對於此，丁文江等雖然咄咄逼人，強調非科學方法不足以真正規範人生，改造世界，卻同樣墮入想當然爾的陷阱<sup>40</sup>。

林毓生先生討論「科學與玄學論戰」指出，儘管這兩派壁壘分明，但雙方叫陣之餘，其實無視彼此共享的立場：那就是，他們都承襲了五四奉「思想文化」爲解決問題的全權方法。他們的出發點或許涇渭分明，卻都自認據有絕對正當性及合理性。尤有甚者，他們所根據的論述邏輯基本都是唯科學主義奉行不疑的「歸納法」。也就是說，他們相信根據經驗歸納所得，真理越辯越明。但林毓生

---

1980年)，頁1-13，引文見頁6。此書爲根據一九二三年亞東書局版《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重印並更名。

<sup>38</sup>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同前註，頁15-44。

<sup>39</sup> 陳獨秀：〈答適之〉，同前註，胡序頁33-42。

<sup>40</sup> 見林毓生的討論。又見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後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之反思〉，《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5-23。

也反問，科學派大軍即使自命已經找到通達真理的門徑，在主觀和客觀、直覺和方法之間畫下不可逾越的紅線，他們果然能夠將心目中的「科學」貫徹始終嗎？

林毓生特別指出，張君勱和丁文江都引用了十九世紀愛爾蘭經濟學及哲學家傑方思(W. Stanley Jevons, 1835-1882)的《科學原則》(*Principles of Science*, 1874)<sup>41</sup>，作為攻防科學方法的例證，但兩人忽視傑方思理論的細微處：「歸納法固然能解釋自然現象潛藏的法則，但是為了達到這一效應，吾人必須發明假說，按照經驗演繹推論。歸納法則是演繹法的反向操作。意即自然法則的建立或推翻來自對一假說的邏輯推演，並將其結果與實證材料觀察所得做出比較而得。」因此「科學步驟的本質」離不開「假說和演繹(hypothetic-deductive method)」<sup>42</sup>。假設、擬想和想像是不可或缺的要素<sup>43</sup>。

如上所述，魯迅早年棄醫從文，對科學與文學之間的關聯有一系列思考，甚至觸及日後科學與玄學論戰中的諸多議題。根據魯迅早期文論的邏輯，我們有理由推測他對張君勱、丁文江理論的回應不會苟同。魯迅早在〈科學史教篇〉就對內籀(歸納)法表示保留，並對達爾文主義的進化因果邏輯不以為然。他企圖在科學的實踐過程裏找到「懸擬」和「聖覺」，而當他宣稱「偽士當去，迷信可存」時，他不啻是對單一線性時間邏輯及科學知識大作發難文章。錢理群看出

<sup>41</sup>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頁26。

<sup>42</sup> 「他們都相信主觀性(主體)與客觀性(客體)是根本不可逾越的，彼此完全絕緣地各自屬於一個獨立的範圍，他們同時都認為歸納法是科學方法的主要部分，能對付客體範圍內的問題(對丁而言，這些問題是經由知覺所察覺到的)。但是，丁張二氏共同的見解卻使人覺得很詭異，因為他們都把W. 斯坦利·傑方思(W. Stanley Jevons)的《科學的原則》一書當作自己理解科學方法的權威來徵引。然而，正如俄內斯特·尼格爾(Ernest Nagel)在介紹這部19世紀邏輯和科學方法的經典著作時說：『傑方思清楚地洞悉：不認為科學是受益於「自然」的預期(anticipation of nature)』。」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含意——對「科學與玄學」之爭的研究〉，頁258。

<sup>43</sup> 科玄論戰後，科學主義一枝獨秀。郭穎頤等學者指出在政治上，自三十年代起科學主義即與共產革命掛鉤，不止坐實唯物論、階級論、歷史決定論的進步性，也滲入黨政話語和治理方法。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p. 172. Hung-yok Ip, *Intellectual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1-1949: Leaders, Heroes and Sophistic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65-66. 西方自由主義學者如波普爾(Karl Popper)、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更認為科學主義與集權主義(不論左右)交相為用，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1945), Friedrich von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1944)；當代中國學者如汪暉則從左翼立場提出反駁。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二部科學話語共同體(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15章。

「神思」與「構思實驗」之「學」為兩種不同把握世界的方式，都具有認識論的高度，可謂知言<sup>44</sup>。郅元寶也曾就「科學」、「神思」、「本根」之間的密切關聯，作出縝密論述<sup>45</sup>。

誠如識者指出，科玄論戰眾說紛紜，魯迅其實頗有發言資格。但他卻始終保持緘默，毋寧令人好奇<sup>46</sup>。推而論之，如果文學曾是五四最受矚目的論題之一，論戰中文學的缺席，就更值得思考。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推動文學改良和文學革命的兩員大將胡適和陳獨秀，在論戰中各據一方發表高論，但他們所論卻絲毫與文學無關。魯迅的沉默，陳獨秀和胡適的移轉陣地，恰恰點出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尷尬位置：文學已經被架空，成為視而不見的工具。

不論科學、玄學派，以及陳獨秀所代表的唯物派，其實都是以「思想文化」為前提，作為解決中國危機的方法，卻從未對其載體——語言、修辭、論述——有過任何懷疑。而就在論戰前幾年，他們所使用的白話文才剛剛因胡適、陳獨秀的鼓吹獲得前所未有的注意。語言改革被視為文學革命的根本，而文學革命又被視為國家復興的根本。語言改造有兩個目標：在語法、語意上力求透明無誤的呈現現實；在言說上確保順暢無礙的溝通對話。這一改造在物質方面又因為新式印刷技術和西洋書寫工具的引進而增強。語言改革最終目的指向一套更新中文思考方式的教育政策，一種藉語言重現現實的模擬信念，以及一則以強國強種為前提的真理宣言。五四先鋒們視白話文為「科學」而「民主」的溝通工具。而在文學表徵上，寫實主義小說被認為是直搗事物真相的重要發明。

魯迅未嘗不支持文字與文學革命，卻早早看出其中問題。就在多數同行欣欣然運用白話文、新文學描摹社會、號召革命時，魯迅意識到「文學」本身一方面被無限上綱，一方面卻已經被視為當然，有若無物。與此同時，所謂的文學「革命」性已經被簡化成意識形態的藉口。一九一八年，魯迅在〈狂人日記〉裏就點出文言和白話間既分裂又糾纏的關係，他甚至認為文言或白話在各自的系統內，已經矛盾重重。終其寫作生涯，魯迅從未停止懷疑語言和書寫二者間是否真能溝通無礙。

魯迅的曖昧姿態甚至延伸到「文」的物質層面。我指的是民國初年魯迅對

<sup>44</sup>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頁73。

<sup>45</sup> 郅元寶：《為熱帶人語冰：我們時代的文學教養》，頁47-66。

<sup>46</sup> 劉禾著，孟慶澍譯：〈魯迅生命觀中的科學與宗教（上）——從《造人術》到《祝福》的思想軌跡〉，《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頁4-12；2011年第4期，頁4-13。

漢魏碑文拓片的搜集和解讀<sup>47</sup>。那是一個聲響闐寂，字跡漫漶不可辨認的世界，然而魯迅樂此不疲。透過拼湊、辨識千百湮沒斷裂的拓片搨印。這令人聯想到一九三五年魯迅就錢起詩歌對朱光潛所作的批判。他強調利用「懸想」的能力，回溯文物（如古鼎）、語言（如拓片）的歷史痕跡。魯迅似乎在玩味「過去」之所以為過去，正是因為其意義的渺茫散亂，有賴「懸想」作出激進的溯源詮釋。在這一層次上，魯迅反思漫長的時間歷程裏，書寫與時俱增的隱諱性和不確定性。藉此他批判文字語言——不論新舊——的透明性迷思，也對當代啓蒙運動家們強不知以為知，沾沾自喜的歷史觀提出質疑<sup>48</sup>。

魯迅沒有直接參與科學與玄學論戰，因為他可能看出科玄雙方以及左派的論述立場也許不同，但論述邏輯如出一轍——都相信「真理」以及附加的知識的權力越辯越明，也都相信他們的語言論述，能夠一清二楚的表達真理。相對於此，他以文學的形式回應了論戰的僵局。這包括了《吶喊》、《彷徨》中諸多小說試驗，《野草》等奇詭的散文詩歌，以及數量龐大的雜文。

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就無從保證結果。魯迅何嘗脫離他的科學訓練？但他對事物的觀察和設想如此「無微不至」，以致漫漶出丁文江式「歸納」法邏輯和幅度之外，暴露最荒涼散漫的生命物質性。他對玄學家所投射的彼岸、精神的世界其實好奇不已，但上下求索的「天問」反而逼出了更黑暗，更玄祕的所在。他對陳獨秀的唯物論也許心有戚戚焉，但他所理解的「物」顯然遠遠超過馬列主義的布置，直達「無物之陣」。

這是「魯迅的」文學革命。重覆前述，這文學的革命性不僅在於亦步亦趨的反映人生，也在於直面人生晦澀的、難以穿透的物質性；不僅在於改變現狀，也在於認知現狀深處、無限「俱分進化」的潛力。鼎革以文，因為文一方面指向太初從無到有的創造性，也指向當下現象與表徵的高度不確定性。如果僅在寫實 /

<sup>47</sup> 見楊永德、楊寧：〈魯迅與碑拓〉，《魯迅最後十二年與美術》（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頁209-211。魯迅自一九一二年開始收集碑拓，當時他任職北京教育部。他對碑拓的熱忱持續至一九一〇年代末至二〇年代初，編著了三本個人收藏的墓碑與石刻拓文的專輯。直到一九三五年末至三六年初，透過臺靜農等友人的協助，魯迅依舊盡心收集漢代碑拓文章。

<sup>48</sup> 有關五四前後人物藉復古以辯證維新的思路和作為，見木山英雄的討論，木山英雄著，趙京華編譯：〈「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頁209-238。

現實主義的脈絡裏解析魯迅，其實局限了他文學觀的最激進面<sup>49</sup>。套用科玄論戰的話語，科學必以「神思」和「聖覺」為前提，而玄學不能自外「懸擬」和「懸想」。前者提醒我們任何斬釘截鐵的實驗必須有假說和想像的介入，後者提醒我們任何理所當然的「人生觀」必須在歷史與虛構交織的脈絡中，反復接受檢驗。

然而魯迅的想法較此尤為複雜。他的「神思」飛揚蹈厲，卻終究瀰漫鬼氣：「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沈重。」<sup>50</sup> 他的「懸想」無論如何要跳脫事物和思想的窠臼，總似乎難以避免惡性循環。文學因此是科學與玄學之間粘滯飄忽，不能擺脫卻也不能或缺的界面——「中間物」<sup>51</sup>。這恰恰是號稱一清二楚的科學方法或玄學人生觀所難以解決的。

早期魯迅曾期望摩羅詩人，發出真的「惡聲」抨擊傳統。但五四之後，他的「摩羅詩力」所煽動的狂熱不僅能帶來文學革命的衝動，也陷入希望和絕望的輪迴。一九二五年，魯迅在〈墓碣文〉中將他的詩性主體刻畫為一個抉心自食者，一個自噬其身的主體：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後，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則，離開！……<sup>52</sup>

而「中間物」導向了更激進曖昧的「無物」——那瀰漫世界和他心中、無所不在的虛無。魯迅〈這樣的戰士〉描寫「無物之陣」：「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而作為反抗者，「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sup>53</sup>

從「立人」的觀點來看待魯迅的「無物」，魯迅的述作的確充滿無所不在的虛無與惶惑。我們只能以「否定的辯證法」來證實他對生命和現實的關心。但與此同時，魯迅已經一再暗示，跳脫「立人」的框架，文學革命者所探索的「物」的終末有無，才更懾人心魄。魯迅是叩問一個「有意義的」科學與玄學以外的更廣袤的世界。

「無物」之陣不能僅以道德或知識的虛無來對待，那裏「沒有愛憎，沒有

<sup>49</sup> 見拙著：*Fictional Realism in 20<sup>th</sup>-Century China* 第一章的討論。

<sup>50</sup> 魯迅：〈寫在《墳》的後面〉，《墳》，頁301。

<sup>51</sup> 同前註，頁302。

<sup>52</sup> 魯迅：〈墓碣文〉，《野草》，同前註第二卷，頁207。

<sup>53</sup> 魯迅：〈這樣的戰士〉，同前註，頁220。

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sup>54</sup>。無物之陣超越夏濟安先生以革命犧牲為前提的「黑暗的閘門」<sup>55</sup>，或張灝先生以道德坎陷為出發點的「幽暗意識」<sup>56</sup>。那是「失去的好地獄」以外的另類空間：猶如天體物理學者定義的「暗物質」(dark matter)，湧動無限不可見、不可測的物質能量<sup>57</sup>；或人類學者所定義的「暗物質」，蘊含無限默會致知(tacit knowledge)的潛力<sup>58</sup>。「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裏。只有我被黑暗沈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sup>59</sup>

是在這一層次上，「神思」和「懸想」所指向的虛無，可以是尼采式的否定，也可以是無盡的「虛」位，以待「有」的填充。「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sup>60</sup> 跨越理性或人生觀——或科學與玄學——最後一道防線，文學主體是否能自我超越？還是「自噬其身」？這樣的懸念成為文學最大的魅力以及批判能量所在。以此，魯迅文論的「懸學」呼之欲出。

#### 四、還是「在醫院中」

五四文學革命之後的一百年，中國文學歷經起落，基本仍奉魯迅為宗師。但承續以上的論述，魯迅文論中「懸想」與「神思」的面向，其實沒有受到重視。

<sup>54</sup> 魯迅：〈希望〉，同前註，頁181。

<sup>55</sup> T. A. Hsia, "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Hsün,"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pp. 146-162.

<sup>56</sup>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1-24。相關討論，見拙作：“Panglossian Dream and Dark Consciousnes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Utopia,” in *Utopia and Utopia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Texts, Ideas, Spaces*, eds. David Der-wei Wang, Angela Leung, and Yinde Zha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chapter 3。

<sup>57</sup> James Peebles, "Dark Matter," *PNAS: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40 (Oct. 2015): 12246-12248; first published May 2, 2014, <https://doi.org/10.1073/pnas.1308786111>，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

<sup>58</sup> Daniel Everett, *Dark Matter of the Mind: The Culturally Articulated Unconscio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sup>59</sup> 魯迅：〈影的告別〉，《野草》，頁170。

<sup>60</sup> 魯迅：〈墓碣文〉，頁207。

文學史論述及一般批評所強調的，不脫大師感時憂國的塊壘，或批判現實的精神。時至今日，以文學反映人生，改造民心士氣的說法依然是主流論述，寫實／現實主義敘事也依然是「作家協會體」寫作的大宗。至於文學與政治宣傳互為因果的說法，就更向文藝的工具性靠攏。追本溯源，我們固然可以在早期魯迅文論中發掘可以附會的線索，但梁啟超才是真正始作俑者。如本文首指出，梁氏〈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堪稱是現代文學政治論述最重要的基礎——而且從毛澤東「延安講話」到習近平「講好中國故事」一脈相承。

從宏觀立場來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原無可厚非。但在新世紀文學的開端，我們見證五四正統文學論述和實踐疲態畢露。各種傳媒的興起尤其加速文學市場的式微——雖然「文學」作為「群治」的政治資本力道未嘗稍減。值此之際，科幻小說異軍突起，十餘年內引起全中國甚至全球華語讀者的熱烈反應，不能不說是新時代文學最值得重視的現象。劉慈欣的《三體》等作暢銷全球，已然形成小型學術文化工業，與劉同輩分的韓松、王晉康也各擅勝場。年輕世代科幻作家如陳楸帆、郝景芳急起直追。相形之下，主流寫實／現實文學顯得乏善可陳。

但我已多次論及，新世紀的科幻熱潮並非前所未見，二十世紀的開端已有一次科幻小說勃興現象<sup>61</sup>。梁啟超提倡「新小說」，其心目中的理想文類就是科幻；他的《新中國未來記》遙想大中華民國烏托邦，雖然未竟終篇，仍必須視為現代小說的濫觴。其他如吳趸人的《新石頭記》、陸士鏗的《新中國》、東海覺我（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譚》、碧荷館主人的《黃金世界》等此起彼落，一時烏托邦與惡托邦，機器人與造人術、太空冒險與時光隧道等話題充斥說部。科幻以其跨越物外的想像，穿越時空的情節，還有逾越法理的隱喻，在在指證晚清政教、知識系統面臨巨變的徵兆。然而科幻敘述模式僅止曇花一現，在五四大轟下迅速為寫實／現實敘事模式所取代。賽先生光臨中國以後，科幻反而沒有立足之地。這其中有關知識／真理話語權的較量，以及文學作為一種政教建構的可塑性，自然耐人尋味。

在本文的範疇裏，可注意的是晚清那場科幻熱潮中魯迅的角色。這一時期正是魯迅開始思辨「懸擬」、「神思」、「聖覺」的階段。一九〇三年，魯迅在翻

<sup>61</sup> 見拙著：*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五章的討論。



譯儒勒·凡爾納 (Jules Verne) 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 和《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時，提出他的烏托邦想像：

凡事以理想為因，實行為果，既蒔厥種，乃亦有秋。爾後殖民星球，旅行月界，雖販夫稚子，必然夷然視之，習不為詫。據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則雖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戰禍又起。嗚呼！瓊孫之福地，彌爾之樂園，遍覓塵球，竟成幻想；冥冥黃族，可以興矣。<sup>62</sup>

二十世紀初世界變動，魯迅感歎「瓊孫之福地，彌爾之樂園」，「遍覓塵球，竟成幻想」。他盼望「冥冥黃族，可以興矣」。一九〇五年，魯迅寫出〈造人術〉。這篇作品源自美國作家路易斯·斯特朗 (Louise J. Strong) 創作的，〈一個非科學故事〉 (An Unscientific Story)，魯迅根據日文翻譯再改寫成中文。小說想像「人芽」的生成，用以改造人種，更新國民<sup>63</sup>。但魯迅並未呈現原作中的陰暗面：實驗室中「人芽」不斷複製，可以成為無數克隆人，反噬其主。學者嚴鋒、宋明煒都已指出，〈狂人日記〉想像人吃人的狂歡「文明」，迫害與被迫害狂所帶來的集體社會盲從／催眠效應，還有更重要的，以治療個人，造福社會為前提的生化政治 (biopolitics) 所形成的天羅地網，都透露科幻小說的印記<sup>64</sup>。

一個世紀後，魯迅和晚清民初一代作者所實驗的科幻創作，再度吸引中國讀者。我們不禁要問，科幻文學在新世紀捲土重來，究竟意味什麼？「懸想」與「神思」又能發揮什麼新的動力？韓松最新的《醫院》三部曲可以為例。

一九八二年韓松在《紅岩少年報》發表第一篇科幻小說〈熊貓宇宙〉。新世紀末之交以《火星照耀美國》（又名《2066年之西行漫記》）引起廣泛討論。這部小說描述二〇六六年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然發生，美中霸權易位，中國其實已經被人工智慧控制。然而在國際政治之外，還有星際政治：火星人即將來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地球文明毀滅前最後的神話。二〇〇八年韓松以汶川地震為

<sup>62</sup>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全集》第十卷，頁163。

<sup>63</sup> 有關〈造人術〉及晚清科幻小說的討論所在多有，最近的研究包括如賈立元：〈人形智能機：晚清科幻小說中的身心改造敘事〉 (fiction)，《中國現代文學》第35期（2019年6月），頁3-28。又見 Carlos Rojas, "Introduction: 'The Germ of Life,'" Special Issue on Disease and Discours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3.1 (Spr. 2011): 1-16。一般認為魯迅根據日文翻譯，可能未曾得見英文原作全貌。

<sup>64</sup> 宋明煒：〈《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魯迅與中國當代科幻新浪潮，兼論寫實的虛妄與虛擬的真實〉，《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頁201-228。

背景寫了《再生磚》，揭露災後重建過程裏不可告人的建材秘辛。二〇一一年以來的《軌道》三部曲——《地鐵》(2011)、《高鐵》(2012)、《軌道》(2013)——更進一步思考在一個高速運轉的密閉空間裏，人與人，人與速度之間的奇詭關係。這是一個動態版卡夫卡式的世界，所謂交通，不過是永劫回歸的工具，生老病死的循環。

韓松曾說：「中國的現實比科幻還科幻。」<sup>65</sup>的確，文學反映人生那套公式已是強弩之末，不足以刻畫當下光怪陸離的現實於萬一。韓松一輩科幻作家出奇制勝，以最不可思議的方式暴露和諧社會裏種種怪現狀。但韓松的意義不在於對現實批判而已。他對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相互接觸、消磨如此悲觀，以致充滿末世論式的想像。早期《宇宙墓碑》(1991)描述宇宙猶如鬼域，外太空墓碑林立，〈我的祖國不做夢〉(未發表)諷刺有夢的強國公民從來就是行屍走肉，《紅色海洋》(2004)投射核戰以後人類依然持續殺戮史，未來就是過去<sup>66</sup>。韓松認為「幽閉才是世界的本質」<sup>67</sup>。在這幽閉的世界裏，人吃人是生存的法則；《乘客與創造者》(2010)中一架永遠航行、總也不能著陸的飛機裏，旅客在半睡半醒之間，形成新的食物鏈。韓松的作品如此陰鬱詭譎，以致劉慈欣認為：「韓松描寫的世界，是我在所有科幻小說中見過的最黑暗的。在那個世界中，光明和希望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sup>68</sup>

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一八年，韓松完成《醫院》三部曲——《醫院》、《驅魔》、《亡靈》。小說裏的主人公因誤喝一瓶礦泉水而被送入一家醫保定點三甲醫院，從此展開有去無回的沉淪。《醫院》描寫「藥時代」裏，人人陷入醫院無盡療程，彷彿是卡夫卡式夢魘；《驅魔》進一步暴露所謂醫院，其實是龐大人工智慧控管的「藥戰爭」戰場；《亡靈》則敘述藥戰爭裏僥倖復活的主人公見證了火星「藥帝國」崛起和崩潰的循環。

在韓松看來，病、醫與藥不只關乎厚生保健或「生命政治」，根本就是人的生存本質：「這座城市裡，每一顆心都有病、都痛不欲生、裸露著呼喚治

<sup>65</sup> 韓松：〈當代中國科幻的現實焦慮〉，《南方文壇》2010年第6期，頁30。

<sup>66</sup> 賈立元：〈鬼域的漫遊者——韓松及其寫作〉，《南方文壇》2012年第1期，頁41-43。

<sup>67</sup> 李剛編：〈科幻作家韓松：幽閉才是世界的本質〉網址：<https://www.yicai.com/news/5072301.html>，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

<sup>68</sup> 同前註。

療。」<sup>69</sup> 人人有病，人人治病，醫與病、死與生不斷輪迴，誰也不能出院。「生命政治」其實也是「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sup>70</sup>。而作為三部曲的終篇，《亡靈》構建了復活之日火星醫院的醫學「大同社會」。「藥帝國」的崛起和崩裂暗示生命「原死」就是「元死」；復活就是復死。什麼是醫院？「整個宇宙都是醫院」<sup>71</sup>。

病、治病與文學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晚清劉鶚《老殘遊記》中的老殘就是個傳統醫生，浪跡各地，治療「東亞病夫」。中國現代國體和病體的比喻由此開始<sup>72</sup>。韓松的《醫院》尤其讓我們想到魯迅；他有意識的向大師百年以前的感嘆致意。魯迅立志習醫的經過，我們耳熟能詳。因為父親死於庸醫之手，他「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sup>73</sup> 一九〇六年幻燈事件以後，魯迅棄醫從文，而他的邏輯仍然是醫治身與心之別：「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sup>74</sup>

魯迅之後，沉痾重症蔓延作家筆下，被浪漫化、道德化、污名化、政治化、寓言化、解構化。從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寫肺病(1928)到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1983)寫梅毒，從吳祖緇的〈官官的補品〉(1932)到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1995)寫賣血，從朱天文的《荒人手記》(1994)到閻連科的《丁莊夢》(2006)寫愛滋病，到胡發雲的《如焉 @sars.com》(2006)寫 SARS，不一而足。西式醫院首見一八三五年的廣州<sup>75</sup>，二十世紀之後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現代醫

<sup>69</sup> 韓松：《醫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頁96。

<sup>70</sup> Achille Mbembe, *Necropolitics*, trans. Libby Meintjes, *Public Culture* 15.1 (Jan. 2003): 11-40.

<sup>71</sup> 韓松：《亡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頁54。

<sup>72</sup>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

<sup>73</sup> 魯迅：〈自序〉，《吶喊》，《魯迅全集》第一卷，頁438。

<sup>74</sup> 同前註，頁439。

<sup>75</sup> Peter Parker (1804-1888) 建立 the Ophthalmic Hospital。Chi-Chao Chan, Melissa M. Liu, and James C. Tsai, "The First Western-Style Hospital in China," *Arch Ophthalmol* 129.6 (Jun. 2011):

療主要建構。抗戰時期巴金的《第四病室》(1944)、新時期諶容的《人到中年》(1981)各以病人和醫生的角度檢視醫院治療、管理甚至人性糾結，延伸而出的社會批判、歷史感懷不言可喻。

丁玲寫於延安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1941)堪稱是現代中國有關病、醫院與文學的關鍵二作。〈我在霞村的時候〉描寫抗戰期間北方農村一位女子遭到日軍強暴，決定「獻身」報國，以肉體套取日軍情報，即使染上近似絕症的梅毒也無怨無悔。她被安排到醫院接受治療，但她已被「污染」的身心是否真能夠通過黨的清潔檢疫？〈在醫院中〉初出茅廬的護士陷入病體與國體、醫療方法與意識形態考驗，不禁彷徨。她最終認清自己的盲點，與黨和病人達成和解。兩部作品都觸及病、身體、性別、醫療與生命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關係，也都因為敘事立場曖昧，成為延安整風中批判的對象。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展開整風運動。運動雷厲風行，口號正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傅科(Michel Foucault)論「異托邦」(heterotopia)<sup>76</sup>，視其為一過渡性社會空間，如醫院、軍隊、墓地、樂園等，以利社會管理。經由政治建構、技術管理、想像投射、權力布置，異托邦成為外於正常社會的另類空間。異托邦雖然位於制度或想像的邊緣，投射一個社會的欲望或恐懼，但也因其「他者」位置，與主流權力形成或排斥，或共謀的互動關係。傅科認為這一關係是現代性的一種表徵。但他的理論如果置於中國社會主義論述中檢視，顯然有所不足。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厲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作為隱喻的醫院不再僅是隔離或勸懲的異托邦空間。整風暗示思想病毒無孔不入，人人「必須」自危，自省自救，然後救人。換句話說，「毛記醫院」的空間無限擴大：延安就是社會主義的大醫院，在這座醫院裏，人人都可能有病，有待黨和主義的診斷和救治。異托邦不是例外狀態，而是常態存在。甚至異托邦就是烏托邦。

從這一脈絡來看韓松的《醫院》三部曲，我們才能了解此作的意義。三部曲的首部《醫院》始於醫院實況報導，逐漸進入迷宮世界。《驅魔》則暴露醫院其實早就為人工智慧管理，由所謂「司命」掌控一艘醫院大船，航向紅色海洋。

791-797.

<sup>76</sup>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 translated from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5 (1984): 46-49, <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 檢索日期：2020年8月15日。

這是三部曲最精彩的部分。醫院的病人遊歷了高科技控管中心、換頭術核心區、意識上載室、末日「壇城」新世界、藻人養殖場、火葬場與食堂聯營體等多處勝景，逐漸探出醫院船的秘密。人工智慧走火入魔，而被其驅逐出病房的醫生則建立了影子醫院，形成對峙。病人最終發現，所謂住院其實只是一次虛擬治療過程，紅色海洋的驚濤駭浪沒有一滴水。更怵目驚心的是，醫院認為人類已經病入膏肓，必須消滅。

到了《亡靈》，醫院在火星上成就無遠弗屆的「藥帝國」，進行另一波將病人置之死地又起死回生的「造人術」。「有了病人，才有醫院；有了醫院，醫生就能為病人謀幸福。所以哪怕是亡靈，也要救活你們。這正是醫院的根本使命——救活人，更救死人。」<sup>77</sup> 小說尾聲，但見火星荒原上林立「附近有高大的廢墟，似乎也是醫院，或醫院的分部，是早前的人類或外星人修建的。但是根據費米悖論，外星人並不曾來訪。那麼，還是進化為了生命的醫院的自我複製吧？」<sup>78</sup>

韓松不僅意在寫出後社會主義的醫院寓言，更讓政治隱喻一躍而為存在隱喻。人生而有病，醫院成為宿命。就在黨國信仰或教條不足以約束病人的症狀時，更細膩的生化資訊管理早已準備就緒。毛澤東的「治病救人」已經過時，丁玲當年的困惑不再成為問題。醫院的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製」病救人；沒病找病，不斷發現——發明——疑難雜症，百般治療，讓病人死去活來，繼續住院。所謂「死亡政治」，莫此為甚。病人和醫生，病毒和人工智慧，成了命運共同體。醫院無所不在，甚至有了形上意義：

醫生開出藥方，發放藥品，培育病人，造出下一個宇宙。船就在這些無窮無盡的世界中航行。沒有邊際的汪洋大海喲……永生的醫院呀，不是天堂，亦非地獄。孤獨，徹底的孤獨……但船長相信，彼岸也許下一刻就會泡沫般的冒出來，啊，從那盛滿消毒液的滔滔洪水中咕嘟一聲兀然浮現。<sup>79</sup>

<sup>77</sup> 韓松：《亡靈》，頁 25。

<sup>78</sup> 同前註，頁 237。

<sup>79</sup> 同前註，頁 268。

## 五、「講好醫院故事」

回到本文的框架：韓松與魯迅的跨世紀對話。我認為韓松的《醫院》回應了魯迅當年的「懸想」與「神思」。「懸想」讓韓松跳脫敘事現狀，審視醫院作為隱喻的歷史縱深，看見「看不見」的事物。「神思」更驅使他將醫院帶向宇宙太空，從而投射後人類思考。更重要的，當代國家論述甚囂塵上，「講好中國故事」成為時代號召<sup>80</sup>。面對這一後社會主義的「虛構敘事轉向」，知識界固然不乏反思聲音，卻有更多論述隨風起舞。當此之際，《醫院》之類的科幻小說異軍突起，才顯示文學的批判力量，也為將近一百年前的科學與玄學論戰，提供了遲來的文學回應。

《醫院》三部曲蘊含著與魯迅對話的巧思。末法時代的醫院是個沒有阻攔，卻無所逃遁的「鐵屋子」，進得來，出不去。而當病人和醫生陷入重重互為主客——或互為主奴——的幻境裏，那是藥時代的「無物之陣」。小說的主人翁不是狂人，卻是病人。他陷在「醫藥」吃人的時代裏，注定病無所終。

在《亡靈》高潮，火星上矗立著三萬年以後的醫院，一座集國家機器、生化與死亡政治，生產勞動分配於一身的機構。塵沙漫漫，宇宙洪荒，生死輪迴已經沒有意義。我們想起魯迅所說：「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

但韓松與魯迅的對話不止於此。「懸想」與「神思」也不必僅作為社會或歷史批判的方法。藉著龐大的醫院神話，韓松其實重啟早期魯迅對科學與文學的批判性思考，也對八十年代的「科」、「文」之爭，提出反駁<sup>81</sup>。在《驅魔》中他描寫一位萬古大夫，號稱「惡魔播種者」，也是小說家。年輕時候是位文學愛好者：「醫生哪怕解剖一千具屍體，也無法了解生命的全部……所幸還有文學。」<sup>82</sup>從莎士比亞到曹雪芹，從蘇東坡到托爾斯泰，文學作品以千變萬化的方

<sup>80</sup>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講好中國故事」，自此成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宣口號。成千上百學術文化活動均以此為標的。參見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9/0222/c40531-30897581.html>，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間，習近平再次呼籲「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參見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19/c40531-31639809.html>，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

<sup>81</sup> 李靜：〈當代中國語境下「科幻」概念的生成研究——以1970-80年代之交的「科文之爭」為個案〉，未刊稿。

<sup>82</sup> 韓松：《驅魔》（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頁140。

式回應人生疑難雜症。「原來一切不過是文學本質上不是科學，而是文學。」<sup>83</sup> 他為病人設計兩種自我，體驗的自我和敘事的自我。他將敘事帶入治療，輸入病人的病歷與記憶，藉以消除他們的疼痛。「看病，首先是個信仰問題；人生，就是一份治療套餐。」<sup>84</sup> 在各種先進醫療手段之上，「講好醫院的故事才最重要」。「哪怕它有一天沉入海底，但作為故事還會口口相傳。只要聽眾信了，醫院便不滅。」<sup>85</sup>

魯迅早在〈科學史教篇〉裏表示對科學方法的保留，以及對「神思」和「神話」的嚮往。對他而言，後兩者的無稽之談反而直指事物的本質，映照主體內曜的「白心」。《吶喊》序裏魯迅棄醫從文的宣言，更進一步坐實他對文學的信念。但如前所論，中國現代性的追尋道阻且長，醫學與文學——或科學、玄學與文學——的糾結無時或已，八十年代「科」、「文」之爭只是延續此一糾結。《醫院》於科學與玄學論戰將近百年後出版，因此耐人省思。韓松彷彿代替魯迅，作出遲來的回應。誠如李志良所言，《醫院》三部曲的底線無它，就是「反科學主義」<sup>86</sup>。作為五四最重要的知識論遺產，百年來藉科學——科學主義——之名的現代化方案為中國帶來多少進步，也就帶來多少斫喪。科學與玄學論戰之後，科學派大獲全勝。日後中國共產黨興起，更時時視馬列主義為最「科學」的主義。在唯物論的天地裏，容不下曖昧的「中間物」，更何況「無物」<sup>87</sup>？

魯迅藉由文學質疑科學毋庸置疑的樂觀主義，同時更揭露任何實證主義下想像的必要。但韓松心目中的文學不再像青年魯迅設想那般能夠直指生命原相——而是「元」文學的不斷自我指涉與解構。事實上，魯迅作品從來內蘊極大的緊張性。摩羅詩人的「惡聲」既能攫人之心也能讓人自嚙其心。〈狂人日記〉字裏行間既是謔言囁語也是逼人告白。到了《醫院》，韓松將這樣的緊張性帶上臺面，

<sup>83</sup> 同前註，頁 140。

<sup>84</sup> 同前註，頁 147。

<sup>85</sup> 同前註。

<sup>86</sup> 「學了大先生，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原來三本書其實寫的都是一句話：『反科學主義』！」李志良：〈韓松《亡靈》兼及「醫院三部曲」：科幻文學的「哲學境界」〉，《中華讀書報》第 16 版（科學文化），2018 年 8 月 8 日。

<sup>87</sup> 參見馬克思誕辰兩百周年紀念，陳冬東：〈感悟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紀檢監察報》，2018 年 5 月 3 日；徐成芳：〈從馬克思身上汲取科學智慧和理論力量〉，《人民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index.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卻給出了犬儒的「後學」答案。萬古大夫可就是科幻版的摩羅詩人？果如此，這位新時代的醫生到底如何定義自己的「惡魔性」？他並不棄醫從文，而是醫文雙修。他明白科與幻其實相生相剋，醫院需要故事，以便讓病人渡過難關，卻也同時構成另一波病灶的起源。文學是人工算法，也是超級病毒。

韓松更進一步指出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甚至到達「發明」文學，控制想像的階段。《驅魔》中病人在醫院船上醒來，發現世界被人工智慧統治，病人成了演算法的一部分。「藥戰爭」代替核戰爭，生命成爲了魔障、痛苦、解脫的循環遊戲。病人爲了尋找失去的記憶，四處探險，最終發現之前就醫住院的經歷只是一次虛擬的治療過程，目的是「驅魔」。

與其說《醫院》三部曲對科學與科學主義提出質疑，不如說是對玄學提出發人深省的思考。歷史的後見之明告訴我們，共和國的科學（主義）敘事從來沒有離開「神話」層面。毛澤東時代的造神運動曾經鋪天蓋地，但並未達形上超越的層面。文革之後，「放逐諸神」一度成爲論述焦點<sup>88</sup>。上個世紀末新左、新自由、新儒家三大陣營交戰，竟創造出不可思議的空間，爲諸神歸來鋪路。例如八十年代曾經倡導基督神學的劉小楓改換方向，致力恢復漢代公羊學派讖緯之學的晚清脈絡，作爲當代天命聖王的理論基礎<sup>89</sup>。以「天下論」知名的趙汀陽甚至提出將中國視爲一個「政治神學」概念：「中國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國本身，或者說，中國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爲存在原則的中國就是中國的神聖信念。」<sup>90</sup>「政治神學」始作俑者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中國魂兮歸來。學者汪暉則從魯迅作品中找出《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sup>91</sup>，強調底層階級求取生存的本能猶如蠢蠢欲動的幽靈，蓄勢待發。汪暉稱這種能動性爲「向下超越」。

這是「玄學」在新時代的復歸。無可諱言，這些學者各有專業訴求，感時憂

<sup>88</sup> 劉再復：《放逐諸神》（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4年）。

<sup>89</sup> 劉小楓：〈「詩言志」的內傳理解——廖平的《詩緯》新解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頁9-23。

<sup>90</sup> 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爲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頁17。

<sup>91</sup> 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對汪暉而言，阿Q雖然粗鄙無文，但他暴起暴落的生命未必一無是處；至少在六個瞬間裏，阿Q顯示他對社會的彷徨以及改變現狀的微弱吶喊。中國的社會因循苟且，但在循環的過程中，政治潛意識也一樣去而復返，幽幽縈繞，彷彿「有鬼」一般。阿Q因此沒有白白犧牲。



國的情懷也躍然紙上。但如果我們效法魯迅的「懸想」精神，撥去層層理論和修辭，就不能不驚覺五四一百年後的知識分子仍然爲了正確的「人生觀」焦慮不已。在後革命的時代裏，他們明白以科學爲名的主義有時而窮，也理解任何標籤的歷史進化論不再能自圓其說。他們轉而在讖緯之說，在政治神學，在瞬間超越上下功夫，他們希望開出藥方，一舉正本清源。他們都是萬古大夫的擁護者。他們急於講好中國——不，醫院——故事，而且把故事越說越玄。

回到本文開始的提問：魯迅面對五四之後的科學玄學論戰，可能的回應是什麼？魯迅當時保持沉默。而百年以後小說家韓松以《醫院》三部曲再次提醒我們，魯迅的志業是「懸想」，是「神思」，是文學。面對人所創造與被創造的生命諸多難題，文學以相生相斥的晦澀與清明，同呈現病灶與解藥。

「神思」無中生有，「懸想」跨越虛實，兩者都根植於歷史內外的無物之陣，指向解放的可能，也沉思其不可能。五四後與新時代的科學與玄學派不會滿意這樣模稜兩可的定義。但文學的革命性——及其自嚙其身的反噬性——恰恰展現其中。

文學既非科學，也非玄學；文學是「懸學」。我們想到《醫院》三部曲的開端。亙古永夜的太空裏，三名僧人駕駛「孔雀明王號」太空船航向火星，他們尋找佛陀，卻看見醫院。衆生皆苦，存在就是病，也是醫院。經過多少劫毀，三部曲的結尾火星醫院又陷入新一波醫生與病人的戰爭。「亡靈之池成功轉型爲生命之池，這也喻示要創造更新的更強亡靈。新物種將有新信仰喲。如此一來，就可以抵禦任何一種不測之災了。宇宙醫院的建設又要開工了。」<sup>92</sup>

小說將盡，出現一位女性，她來尋找真相，卻陷入無物迷陣。在大幻滅、大恐懼中，她最後的希望繫於救援瀕死的兒子——救救孩子。但孩子還有救麼？這一切是真實麼？或只是幻像？佛曰不可說。「病房寺廟的鐘聲響起。觀音像的嘴角歛動了一下。」<sup>93</sup>

本文始於漢娜·阿倫特對革命的定義：革命的意義無它，即在於引發前所未見，石破天驚的動人力量。對於上個世紀初中國的改革者而言，那股動人力量就是文學。五四之後，文學與革命逐漸退步爲主從關係，也不再具有干預知識的正當

<sup>92</sup> 韓松：《亡靈》，頁 210。

<sup>93</sup> 同前註，頁 286。

性。然而文學的動人力量豈曾消失？「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sup>94</sup> 魯迅曾如是想，一個世紀以後的韓松也如是想。輾轉其間，真正具有初心的文學作者無畏現狀，開新返本的試探一如既往。他們知道「懸想」與「神思」是一場未完的，永遠不完的，文學革命。

---

<sup>94</sup> 魯迅：〈希望〉，頁 182。

# 「懸想」與「神思」

## ——魯迅、韓松與未完的文學革命

王德威

本文藉魯迅文論的兩項觀念，「懸想」與「神思」，重新提請注意五四「文學」意涵，以及當代的回應。這兩項觀念都強調「想像力的政治」：深入現實盡頭的無物之陣，探勘理性以外的幽黯淵源。「神思」與「懸想」在現當代文學主流論述裏一向隱而不彰，卻意外從新世紀的科幻小說獲得共鳴。本文介紹作家韓松小說《醫院》三部曲及其與魯迅作品的隱秘對話。兩者各據百年五四一端，但都觸及「神思」與「懸想」的多重維度，並展開系列辯證：如身體與國體，瘋狂與理性，疾病與醫藥，入魔與除魅。更重要的，兩位作家都藉此叩問書寫與文學的根本意義，及其革命性真諦。

關鍵詞：懸想 神思 文學革命 科幻小說 魯迅 韓松

## “Fanciful Speculation” and “Divine Thought”: Lu Xun, Han Song, and the Unfinished Literary Revolution

David Der-wei WANG

This essay seeks to reassess the mean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repercussions by looking into the concepts of “fanciful speculation” and “divine thought” as conceived by Lu Xun. Both concepts stress the politics of imagination that inspires on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 and explore the unexplorable. While the concepts have been obscured by the May Fourth canon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through modern times, they have found an unlikely manifestation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The essay offers a reading of Han Song’s *Hospital* trilogy in light of Lu Xun’s concepts, and contemplates the dialectics concerning Chinese modernity, such as the body and the nation; disease and medicine; enlightenment and enchantment; and above all,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Keywords:** fanciful speculation    divine thought    literary revolution  
science fiction    Lu Xun    Han Song

## 徵引書目

- 木山英雄著，趙京華編譯：《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北岡正子著，何乃英譯：《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
- 朱康：〈「神思」、「神話」、「詩歌」：魯迅關於文學起源的人類學敘事〉，《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1期，頁20-24。
- 伊藤虎丸著，張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宋明煒：〈科幻文學的真實性原則與詩學特徵〉，網址：<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416/c404080-31031415.html>，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
- ：《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
- 李志良：〈韓松《亡靈》兼及「醫院三部曲」：科幻文學的「哲學境界」〉，《中華讀書報》第16版（科學文化），2018年8月8日。
- 李怡：《魯迅的精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2012年。
- 李剛編：〈科幻作家韓松：幽閉才是世界的本質〉，網址：<https://www.yicai.com/news/5072301.html>，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
-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二部科學話語共同體，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 ：《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 汪衛東：《魯迅：現代轉型的精神維度》，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2015年。
-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
- 郜元寶：《為熱帶人語冰：我們時代的文學教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徐成芳：〈從馬克思身上汲取科學智慧和理論力量〉，《人民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index.html>，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
- 張君勳：〈人生觀〉，帕米爾書店編輯部編：《科學玄學論戰集》，臺北：帕米爾書店，1980年。
- 張夢陽：〈深讀魯迅，學會思考〉，《光明日報》第5版，2011年10月31日。
- 張灝：《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造五：〈科學之價值〉《東方雜誌》第12卷第7號，1915年7月，頁59-61。
- 陳冬東：〈感悟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紀檢監察報》，2018年5月3日
- 陳新雄：《訓詁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 陳獨秀：《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
- 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楊永德、楊寧：《魯迅最後十二年與美術》，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

- 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
- 賈立元：〈鬼域的漫遊者——韓松及其寫作〉，《南方文壇》2012年第1期，頁41-43。
- \_\_\_\_\_：〈人形智能機：晚清科幻小說中的身心改造敘事〉，《中國現代文學》第35期，2019年6月，頁3-28。
- 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劉小楓：〈「詩言志」的內傳理解——廖平的《詩緯》新解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頁9-23。
- 劉禾著，孟慶樹譯：〈魯迅生命觀中的科學與宗教〉，《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頁4-12；2011年第4期，頁4-13。
- 劉再復：《放逐諸神》，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4年。
- 蔣暉：〈維多利亞時代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誕生：重考魯迅〈科學史教篇〉的資料來源、結構和歷史哲學的命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頁32-42。
- 魯迅：《墳》，《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_\_\_\_\_：《吶喊》，《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_\_\_\_\_：《朝花夕食》，《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_\_\_\_\_：《野草》，《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_\_\_\_\_：《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_\_\_\_\_：《集外集》，《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_\_\_\_\_：《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_\_\_\_\_：《月界旅行》，《魯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 韓松：〈當代中國科幻的現實焦慮〉，《南方文壇》2010年第6期，頁28-30。
- \_\_\_\_\_：《醫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
- \_\_\_\_\_：《驅魔》，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
- \_\_\_\_\_：《亡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
- 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
- 嚴鋒：〈〈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金庸去世標誌武俠弱科幻興〉，網址：<https://new.qq.com/omn/20181113/20181113B1JFY6.html>，檢索日期：2020年7月20日。
-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90.
- Benjamin, Walter.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Chan, Chi-Chao, Melissa M. Liu, and James C. Tsai. "The First Western-Style Hospital in China." *Arch Ophthalmol* 129.6 (Jun. 2011): 791-797.
- Everett, Daniel. *Dark Matter of the Mind: The Culturally Articulated Unconscio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 Translated from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5 (1984): 46-49. [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_heterotopia.en/](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_heterotopia.en/), 檢索日期：2020年8月15日。
- Hsia, T. A. "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Hsün." In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 Ip, Hung-yok. *Intellectual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1-1949: Leaders, Heroes and Sophistic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Kwok, Daniel W.Y.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Mbembe, Achille. *Necropolitics*. Translated by Libby Meintjes. *Public Culture* 15.1 (Win. 2003): 11-40.
- Peebles, P. James E. "Dark Matter." *PNAS: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40 (Oct. 2016): 12246-12248. first published May 2, 2014, <https://doi.org/10.1073/pnas.1308786111>.
- Rojas, Carlos. "Introduction: 'The Germ of Life.'" Special Issue on Disease and Discours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3.1 (Spr. 2011): 1-16.
- Wang, David Der-wei. *Fictional Realism in 20<sup>th</sup>-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Angela Leung, and Yinde Zhang, eds. *Utopia and Utopia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Texts, Ideas, Spac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